

百年前宁波话文献的擦音与塞擦音问题新探

陈佳磊

宁波地区(含舟山)开埠以后,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有不少记录本地方言的文献留存至今,其中主要是一些来华传教士的文献记录,以及后来的地方县志和赵元任先生的记录。这些材料至今已有100—150年的历史,是反映宁波话历史语音变化的珍贵材料。

现代的宁波方言也有诸多前辈专家学者的各种成果的探索与发表,是我们进行研究的另一个材料来源。

本文想通过这些材料来论述百年前宁波话文献的一些语音问题,通过文献的体例细节和字音的标注特点,以及不同文献之间叠加的多重证据,加上对前辈学者关于百年前文献的研究梳理,结合现代宁波方言的研究成果,对宁波话文献的擦音和塞擦音问题进行重新探讨,旨在得出宁波话在百年前就已经尖团合流的结论。

一 引 言

本文参考的传教士资料主要有以下几本:

(1) 睦礼逊(W. T. Morrison, 又译作马礼逊)的《宁波方言字语汇解》(*An Anglo-Chinese Vocabulary of the Ningpo Dialect*, 下简称《汇解》);

(2) 翟理斯(Herbert A. Giles)的《华英字典》(*A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 下简称《字典》);

(3) 穆麟德(P. G. von Möllendorff)的《宁波方言音节》(*The Ningpo Syllabary*, 下简称《音节》);

(4) 庄延龄(E. H. Parker)刊载在中国评论(*China Review*)上的《宁波方言》(*The Ningpo Dialect*)一文;

(5) 穆麟德成书、穆作霖(G. W. Sheppard)修订的《宁波方言便览》(*The Ningbo Colloquial Handbook*, 下简称《便览》);

(6) 蓝亨利(H. Van Vleck Rankin)著的《宁波土话初学》(*Nying-po T'u-wo Ts'u-'oh*, 下简称《初学》)。

我们采用的本地文献主要是民国时期的《鄞县通志》《定海县志》和赵元任(1928)先生《现代吴语的研究》(下简称《现吴》)的宁波话部分。

经过进一步对比,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翟理斯的《字典》和庄延龄的《宁波方言》采用了同一套记音系统,且音系基本一致,《字典》记音丰富,记录了不少的异读。同样地,《汇解》《音节》《便览》《初学》的音系体例也是相互承袭的结果,与徐通锵(1991)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所以实际上,传教士的材料,大体上是分成两个记录系统的。第一个系统是《汇解》《音节》《便览》《初学》的音系,第二个系统是《字典》《宁波方言》的音系。

另外,我们发现更早期的1844年另有卫三畏(S. W. Williams)著的《英华韵府历阶》(*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这本传教士的方言记录也附有宁

波话的不少例字和读音，且记音系统与它们不同，但是由于其系统过于杂乱，且从出版日期推断可能是开埠早期的较为粗糙记录，我们此处未采用。

对于本土材料，我们发现民国时期的《鄞县通志》和《定海县志》中均有过使用变体注音符号及相关文字来说明宁波地区方言的音系及其词汇的情况，且两本县志的注音符号系统上相似，基本无二致。其中，前者是记录的当时宁波府城（今宁波市主城区）的音系，后者是记录的定海府城（今舟山市定海城区）的音系，两地音系均为吴语太湖片甬江小片。

如果单从材料的问世时间线来排布的话，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时间线脉络：

1857年《初学》→1876年《汇解》→1885年《宁波方言》→1892年《字典》（取第1版）→1901年《音节》→1910年《便览》→（1924年《定海县志》）→1928年《现吴》→1933年《鄞县通志》。

《鄞县通志》的所刊方言基本可认定为宁波城中音系，其方言部分的序言也能佐证这一猜测，“昔年编方言时，曾选城市与附郭之土著而年事较富者审定其音以为标准”，故此处不再赘述。

如前文述，传教士音系具备两套不同的承袭性质的记录方案，所以我们大体可以把它们记录时间定为这个音系记录方案出现的最早时间，在我们手头的材料中，它们分别出现不晚于1868年和1885年，此处我们分别记为穆氏音系和庄氏音系。

二 百年前宁波话擦音—塞擦音的问题

2.1 前辈学者的相关研究

关于百年前宁波话传教士记录的擦音及塞擦音问题有颇多前辈学者有过研究和论述。徐通锵（1991）认为中古见系细音已经腭化为舌面音，但是胡方（2001）和袁丹（2015）则认为见系未全然腭化。而相反，袁文认为中古精组细音已经腭化为舌面音、知三章系则是舌叶音类或者舌面音类，他们的差异是音位性记音问题，而徐文和胡文则认为精组细音依旧是舌尖音。陈忠敏（2022b）则认为传教士记音的知三章系记录的是带圆唇性质的卷舌音声母。

前辈学者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汇解》和《音节》的 ky- 类的记音究竟是否是腭化的舌面音；同记为 tsi- 类的精组细音和知三章字到底是什么音值。

前三位学者均未使用庄氏的材料作为对照。其中，徐文当时有提到并未能见到庄氏的记录。陈忠敏则提到了庄氏的记录。

2.2 宁波话擦音—塞擦音问题再发现

由于地方志的记录晚于传教士，所以我们这里先看传教士的记录。

在传教士的记录里，可能为擦音或者塞擦音的符号主要有（大体按中古主要对应的声母排列，此处暂不管特例和特殊的韵类）：

	见系细音	精组洪音	精组细音	知三章系齐齿	知三章系圆唇
字例	轻见期桥巧	责再草测碎	津剪将秋青	朝正抽周长	震中出住失
穆氏音系	ky- k'y- gy- hy-	ts- ts'- dz- s- z-	tsi- ts'i- dzi- si- zi-	tsi- ts'i- si- zi-	c- c'- dj- sh- j'
庄氏音系	c- c'- dj- hs-	ts- ts'- dz- s- z-	tsi- ts'i- dzi- si- zi-	tsi- ts'i- dzi- si- zi-	ch- ch'- dj- sh- j'

这主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第一类见系细音究竟是否早已腭化了舌面音？第三类精组细音和第四类知三章系齐齿的 tsi- 组是否是舌面音？第四类知三章系齐齿是舌叶还是舌面音？

我们最后通过对两套音系进行的重建，会发现，他们的实际音系是基本相同的，如果不考虑音位互补问题，第一类见系细音和第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均为舌面音，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为舌叶音。

这里，我们的思路大概是先分开两个体系分别看，因为我们无法排除两者相差近 20 年的时间，会有语音易变的可能性。

两个音系的第二类声母精组洪音其实都可以简单地构拟成 [ts] ①，这基本上是毫无争议的。

2.2.1 穆氏音系文献的记录细节

对于穆氏音系的记录，我们能看到的声母音值描述主要是来自《音节》的前言。

对于第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的声母，《音节》有如下描述，“ts 和 dz 是 t + s 和 d + z，前者是清音，后者是浊音。当后面跟 ia 的时候，他们的发音是 tsh 和 dj”。②（字母组合 tsh 并没有在穆氏音系的音节里出现，作者想表达的应是 t + sh 的意思。下文同。）

对于第一类见系细音，《音节》则描述，“（腭化辅音）……ky, gy, hy 只能后接 i 和 ü。ky 和 gy 来源于 k + y 和 g + y，现在发音是 tsh 和 dj；hy=h + y，发音如北方官话的 hs，一种古代的 h 和 s 声母的组合。”③

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的描述略粗糙，所以此处我们不表，但是书里甚至提到了在 o 前的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实际上是舌尖音的问题（相当于第二类精组洪音）。

由此看来，实际上穆氏音系的第一三四类，即见系细音、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实际上是混并的，作者未描述对于三四类声母如果跟随带 i 且不是 ia 的韵母，是否合并的问题。

所以，第一类见系细音 ky- 系和第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 tsi- 系是合并了，也可从 hs 得出，由于 hs 主要是用来拼写北方官话的 [ç]，故同时把 ky- 系和 tsi- 系构拟成舌面音是合情合理的。而既然它们占用了舌面音的位置，那么，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的 c- 就只能是舌叶或者卷舌了，且其在现代宁波方言也全部拼读圆唇洪音的字，更佐证了这一观点。

如此看来，前辈学者的构拟各有所长和不足，我们基本同意徐文见系已经腭化为舌面的观点，也基本同意袁文精组和知三章的细音字也已经腭化为舌面的观点，我们认为百年前宁波方言的这几组声母已经在剧烈变化与混并当中了，且传教士在对它们的记录形式上有刻意泥古的嫌疑。

当然，从穆氏记录的音节表看，第一类见系细音 ky- 系、第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

① 本文中凡是字母及组合字母符号代表的是音标意义的，均放入音标括号 [] 中，以与传教士的字母写法相区别，如遇特殊体例部分则另具体说明。

② 原文：ts and dz are t + s and d + z, the first the voiceless, the latter the voiced sound. When followed by ia they are pronounced like tsh and dj.

③ 原文：(Palatalised Consonants.)... Ky, gy, hy, can only be followed by i and ü. Ky and gy, originally k + y and g + y, are now pronounced like tsh and dj; hy=h + y, is pronounced like hs in northern mandarin, a combination of the old h and s initials.

系齐齿 tsi- 系所能拼合代表的韵类与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的韵类是互补存在的，即从现代语言学的视角看，前几类所代表的舌面音和后者第五类所代表的舌叶音是由韵类决定的条件变体，以次清字为例，即如下：

c'ih		ky'i-ts'i	ky'in-ts'in	ky'üoh
c'ing		ts'ia	ky'ing-ts'ing	ky'üong
c'ong		ky'iah-ts'iah	ky'iu-ts'iu	ky'üôh
c'o		ky'iang-ts'iang	ky'ü	
c'ông		ky'iao-ts'iao	ky'üüh	
c'ü		ky'iḁ-ts'iḁ	ky'üüng	
c'ün		ky'ih-ts'ih	ky'ün	

此处看上去有对立的韵是 ih、ing、ü 和 ün，但是传教士有明确记录说在上面左边字母 c 组后面的 i 和 ü 与表格右边的 i 和 ü 并不相同，这一点陈忠敏也已经做出了详细的说明，此处不再详述。

2.2.2 庄氏音系文献的记录细节

对于庄氏音系的记录，我们本也可以从穆氏音系作为参考来推理得出，但其实我们还有别的突破口。庄氏音系除了见组细音记为 c- 系之外，我们发现同体例的《字典》中，中古通摄三等字有比如“中盅”记录成 ciung 的情况，根据历史演变规律，我们如果把第一类见系细音的 c- 系构拟为硬腭辅音是非常不合理的，我们只能认为它已经是舌面音了，这样也正好照应了穆氏音系的构拟。对于第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的音值，庄氏也有相关的描写——

“ts 和 c（换言之，理论上的 k 或者 ky）是纯粹的，或者至少能在所有的元音前清楚地被区别的，除了那些只能接 j, sh, ch,（换言之 tsh）的元音：有一个纯 i（如 i, ing）的例外，在它们之前，ts 和 ci 是相当不可区别的……”^①

我们把这句话翻译成现在通俗的理解就是，有一部分元音（或者韵母）只能接 j, sh, ch 等声母符号（也就是我们表里的庄氏音系的第五类），把这部分元音（或者韵母）排除以后，在 i, ing, ih 前的声母符号 ts 和 c 是不可被区分的，而当符号 ts 拼合洪音的时候，就又和与 c 相对应的洪音声母符号 k 区别开来了。这是由于后者不拼洪音，前者在洪细前面的音值有别造成的。

由于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声母本身和舌面音在演变关系上更加密切，如前文的“中盅”字。所以和穆氏音系一样，我们将第一三四类，即见系细音、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声母，均构拟成舌面音 [tɕ] 类，而将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声母构拟成带圆唇性质的舌叶音 [tɕ̥] 类^②。关于圆唇问题陈文（2022b）也已有较多论述，我们亦不再作详述。

从而我们可以知道，这穆氏和庄氏记录的基本上是同一个音系，只是记音使用的字母体例不同造成的。庄氏描写进一步证实了穆氏在《音节》前文的所用字母体例叙述的音值特点。

① 原文：Ts and c (i.e. theoretical k or ky) are pure, or at least clearly distinguishable, before all vowels but those vowels named which can only take j, sh, ch, (i.e. tsh): with the single exception of pure i (e.g. i, ing,) before which ts and ci are quite indistinguishable.

② 在主元音为圆唇的情况下 ɕ 可不标，下文从之。

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庄氏对宁波话的基于拉丁字母的符号记录,是有一定的正字法成分的。所谓的正字法成分,即,其不一定是完全按照当时的时音来如实作记录的,庄氏对其“宽泛的规则(broad rules)”有这样的表述:“毫无疑问,很多宁波土著,或者住得离宁波非常近的人能够区别与理论规则一致的h, s和sh(包括c, tz和ch,以及它们的低调形式)。”^①另外庄氏说“喜”和“洗”基本(quite)不分,“阅”和“屑”偶尔(occasionally)区分,区分的方式是“阅”读hsih,而“屑”的声母是更纯(purer)的s,而在一般对话中,这些字的声母都可以发成hs,用语境来区分而不产生歧义。

从中,我们也可从不同传教士记录方案的冲突与差异中,得出见组细音和精组细音在百年前就即将完成尖团合流,这种变化来得非常地迅速,尽管在庄氏的调查中,这几组中古声母字尚可能存在最小对立,且其对穆氏的系统记录有所不满。然而综合来看,在当时,这几个声组的区分已经是相当个体化的了,对立十分混乱,合流的大势已势不可挡。

然而,陈文还认为,第五类知三章系圆唇声母是一个比舌叶音舌位更进一步的卷舌音。我们认为这是如何描写这个音值的观点差异。

众所周知,同样是记录为[tʃ]或者[ʃ]的音,在英语中和粤语中听感差异相当大。这个主要是因为这组音的描写条件和发音范畴相当宽泛造成的,英语的这组音从主被动发音部位看,可以认为是龈后-舌叶音,而粤语则不然,它属于齿龈-舌叶音。

英语的舌叶音其实比较接近传统上汉语部分方言音系中知系字的卷舌记音习惯,以及南方人说非母语的普通话时这一组声母的发音,北京话则会显得更加地卷舌化,而粤语则是另一种音质。就舌位的状态来说,粤语的齿龈-舌叶音更接近传统上我们所称呼的舌尖音,而龈后-舌叶音更接近北京话的卷舌音。被动部位的差异,也导致了发这类音的方式甚至即便在同一母语中也存在个体差异,比如卷舌音或者龈后-舌叶音除了可以发成陈文中的舌位产生横向凹槽的口腔状态,也可以将舌头形成一个拱形,甚至舌尖贴下齿龈。

综上所述,陈文中的卷舌音可以相当于我们这里的舌叶音,而陈文中的舌叶可能更接近现代粤语的记音习惯里的舌叶音,而非我们所想表述的舌叶音。

2.2.3 传教士记音与《通志》记音的矛盾与依据

那么,传教士文献为何会把相同的辅音分立,但是又标注他们同音呢?其实传教士的思想也是深受韵书和其他汉语方言影响,传教士在很多书里都会强调所述方言和其他方言以及古代韵书的辖字对应关系,“对应于”“平均的(或者译为‘一般的’‘普通的’)”“相当于”这种词汇经常会出现于描述中,所以就导致了音值描述和具体记录的不统一。

另有一个证据可以证明这个观点的是,高本汉曾提到穆氏和庄氏的记音相去甚远(徐通锵 1991),这就是因为这些传教士的记音都受困于韵书和其他汉语方言的归类 and 对应关系的思想,记录的并不是完全的字母实际读音,而需要完备的补充说明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也招致了后来的庄氏在《宁波方言》中的不满和论争。

而三四类精组细音和知三章系齐齿声母的合流也难怪清代的《鄞县志》载宁波人“呼招为焦,张为将……”了。

而当我们看更后来的《鄞县通志》,甚至结合同时代所记相近音系的《定海县志》,我

^① 原文: Doubtless many speakers of pure Ningpo or at least many living very near to Ningpo, make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h, l and sh (including c, cz and ch, and the lower forms) in accordance with theoretical rules...

们发现几个疑点。这两本书均分尖团，如果从现代汉语的注音符号音值的视角看，似乎在细音下，见系被记录为[tɕ]类型，精组和知三章字为[ts]类型，且[ts]类能够拼合撮口呼。如对比看①：

见系洪音

ㄍ ㄞ gai 該改蓋

ㄏ ㄞ hai 哈海

见系细音

ㄐ ㄩ ju 居舉據

ㄒ ㄩ xu 虚許噓

精组和知三章

ㄆ ㄞ zai 災宰載

ㄌ ㄞ sai 鯉認賽

ㄆ ㄩ zū 諸主翥

ㄌ ㄩ sū 書暑絮

ㄆ ㄣ ziao 昭沼照

ㄌ ㄣ siao 宵小笑

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鄞县通志》的见系洪细声母记录的并不相同，但是精组和知三章系是只有一套声母。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矛盾。如果把表中的ㄆ、ㄌ等相关的声母拟成舌面或者舌叶，就无法照顾到洪音字的问题，不管是传教士、赵元任（1928）还是现代宁波话记录，他们的精组洪音均为舌尖音。

而换一个思路，如果把表中的ㄆ、ㄌ等相关的声母拟成舌尖音，但一来再仔细查看与《鄞县通志》基本同时代的赵元任关于宁波方言的相关记录表（1928），我们会发现，其实宁波话的尖团合流早在1928年就完成了；二来上文已经说到这组音的细音部分传教士记录为腭化的舌面音，反过来在不到十年内再次变回舌尖音，而在现代又变回腭化的舌面音，极其反常的；三来在传教士时代“居举据”和“书暑絮”早就已经不同韵，后者已经变为了舌叶拼合的舌尖圆唇韵，也是矛盾颇多。方志的音系声母格局和传教士甚至是赵元任的记录相较，差异非常参差，甚至完全不符合历史演变规律。

我们认为，《鄞县通志》的编撰者对音系做了存古处理，可靠性有待商榷。有一个可疑的旁证是，我们发现《鄞县通志》正好是在老国音推行后的十余年间出版的，所以可能也暗示了老国音的部分尖团对立思想的影响。

而对于非宁波市区音的记录文献《定海县志》，它的符号体例和《鄞县通志》大体一致，但是中间又掺杂了一些其前文未提到的ㄗㄋㄞ声母（孙宜志2010），所以也是相当粗糙。

因此，百年来宁波话这几类声母组别的演变用音标记录如下：

见系细音 ki- > tɕi-

精组细音 基本保持 tɕi- 不变

知三章 今齐齿呼类：tɕi-；今圆唇韵母类：tɕi-/tɕ- > ts-，如：

① 所注拼音暂依对应关系，将注音符号转写为对应的汉语拼音，并非最终的实际音值。

主 tʃy > tsy, 中 tɕiun > tʃun > tson, 酸 ʃə > sə > sɔ.

后两类字其实在百年前就出现了端倪,《字典》的通摄知三章字的记音相当地混乱,如:

中 ciung [tɕiun], 铤 c'iung [tɕ'iun], 种 锺 chung [tʃun], 重 djung [dʒun], 冲 ts'ung [ts'un], 仲 dzung [dzun].

在庄氏《宁波方言》里,“中”字亦有 tsung [tsun] 的记录,“酸”字则记录了 shōn [ʃə] 和 sōn [sə] 两读。而在今宁波镇海话中圆唇韵母(主要是知三章字,精组字混入)依旧大部分读舌叶音,可以作为一个这方面的佐证,如:

中盅 [tʃon], 酸宣 [ʃə], 主珠 [tʃy].

我们认为镇海话这是精组的圆唇韵并入知三章系圆唇韵的结果,而宁波市区话则走了相反的路径。

三 结 论

沿着前辈学者对历史文献的不断分析和交锋所开辟的路径,以及对新文献的进一步深入挖掘,我们最终发现,早在百年前,传教士记音尖团已经开始剧烈合流,其存在形式上的泥古和受传统汉语及方言语音格局影响的特点,但是整体上还是忠实地保留了对时音的记录,收录了不少异读和特字,且当时的知三章系主要还保留在舌叶的位置上,而部分字尚未完全脱离舌面音,有部分字则有变往舌尖的趋势,说明当时宁波话已经处在剧烈的音变过程的前夜了。

与此同时,我们还对方志音系做出了判断,通过其和传教士音系以及同时期赵元任的记录做出对比,发现其并未完全忠实地记录时音,而是有所保留和相对记录得混乱,更显得忠于传统韵书的结构特点,而未能在体例和记音上表现宁波话的实际声母特点。

参考文献

- 陈忠敏.卷舌音[J].民族语文,2022(3).
- 陈忠敏.论百年前宁波话卷舌音声母[J].方言,2022(4).
- 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M].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长沙:商务印书馆,1915—1926/1940.
- 胡方.试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J].语言研究,2001(3).
- 宁波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宁波市志[M].北京:中华书局,1995.
- 孙宜志.民国《定海县志·方俗志》反映的定海方言特点[J].语言科学,2010(6).
- 汤珍珠,陈忠敏,吴新贤.宁波方言词典[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7.
- 徐通锵.百年来宁波音系得演变——附论音变规律的三种方式[J]//语言学论丛.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 袁丹.从传教士文献和现代方言再论百年来宁波方言声母系统的演变[M]//东方语言学(第十五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6.
-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M].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四种,1928.
- 镇海县志编纂委员会.镇海县志[M].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